

「思维偏好和人文精神」刍议

方佳丽/撰

■ 刘 亭 / 文

日前,有幸参与省外某地“十四五”规划的编制,接着又应邀参加了相关的中期评估及发展新定位的课题研究工作。以下是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。

简单谈三点意见。

一是这次过来接受的任务,可以说是“评估+研究”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续性的系统工程。之前正式做了“十四五”规划,执行到了中期,按照相关的制度,也要求五年规划有一个中期评估。正当其时,市委对于本区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定位,又有了个“双中心”的新提法。这个提法怎么理解和把握?是什么?做什么?怎么做?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的研讨,这也是对下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,做一个前期的指引。

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,就是这次委托的任务。我看了院里的课题方案,很是赞成。那就是要把区里的“十四五”规划的中期评估,和新的“双中心”的战略思路研究给结合起来,但侧重点有所不同:评估的重点,放在问题导向;研究的重点,放在目标导向上。评估就是看眼下哪些问题是突出的,而且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,将怎样影响未来的可持续发展,因此必须要切实加以解决,这就是所谓的“问题导向”。研究的话,就是市委已经给区里明确了这么一个“高大上”的定位,这个定位对于区里的发展来说,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遇,是一个需要牢牢抓住、并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目标导向”,也就是面向未来,面向更长远的现代化新征程,不但是“十四五”后期,包括“十五五”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,我们都需要把握和应对好的新形势和新任务。

按照这么一个想法来理解,不管是从一开始区里到院里提出任务和要求,还是后来院里提交的课题方案,都体现了“过往评估+未来研究”这么一个综合性的通盘考虑,我觉得很合适。

二是“双中心”既然是新的目标定位,还需要有相应的新思维、新价值观和新的工作导向加以配套。不是说什么戈尔巴乔夫的“新思维”,或者现在拜登口口声声讲的“价值观”,实际上我讲的意思是,我们在工作导向上的“偏好”,要有一个转型升级,要有一个守正创新。不然的话,这个“双中心”的目标定位,和我们的实际工作,和正在运作、干着的事情,是相互脱节的,有时甚至是“犯冲”的。那这个新目标、新定位,又怎么可能“新”到位呢?

为了说明我所理解的“新偏好”,我在这里不妨打几个比方:第一个,什么才是我们今后真正的兴奋点和目标追求?发展确实是硬道理,这毫无疑问。但是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把发展归结为 GDP 总量的做大、增速的加快,而对于人本身的“自由而全面的发

展(马克思语)”却关注不够。现在看起来,要更加突出地回到“以人为本”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科学发展导向上。我总是和人说,所谓的目标定位,就是老百姓的小日子过好了就行,这就是各级领导最大的政绩。可千万不要把眼睛都盯在左一顶“帽子”,右一块“牌子”上,追求那些个东西没多大意义。就像李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:“绝大部分老百姓不会天天盯着看 GDP 增长了多少,大家更在乎的是住房、就业、收入、教育、就医、生态环境等身边具体事。”

第二个,原来我们都比较重视硬的,现在恐怕要更多重视软的。硬的如大工程、大投资,像我们这样的高铁新城,绝对称得上是美轮美奂。昨天晚上虽然风大了一点,我一个人出去走路,顺便拍点夜景,没碰到几个人。新城一开始人气肯定是不旺的,它总是要有个过程。但是我们自己的目的一定会很清楚,最后不是为了建楼,而是要聚人气、出大师。我们如果出了像马斯克这样的“大师”,很多颠覆性创新的东西就干出来了。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“钱学森之问”,我们建了这么多的大楼,到时候能出了一些什么大师? 这些个大师能解决的,真是发展中的重大挑战,又是真的能够切实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进步。

不是单纯的“软”,而是“软中带硬”,最后才是实实在在的“硬道理”。譬如说制度供给,又譬如说法治环境,这些好像比不上基础设施的硬环境,但其实正是我们当下最需要补齐补强的。现在各地政府的“双招双引”都很努力,官员们也很辛苦。但是营商环境好不好? 最后还是要看“用脚投票”的情况。说一千道一万,最后人才的净流入、资本的净流入,结果还不如以前了,那这个营商环境的建设,不说是“白忙活”,起码也是劲没用到点子上。我主张营商环境建设不要搞那么多指标,搞那么多考核,好像大家都很忙碌,实际上是“内卷”,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浪费了。

第三个,原来我们比较习惯于党政推动,现在恐怕要更多重视社会和企业的作用,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作用。党政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,需要有个发动推进的机制,这本身没错。但凡事都搞一套严密的指标体系和动作规范,然后回过头来再考核有没有完成和到位,这样一整个地运作下来,为了把上级的“规定动作”做好做到位,结果连基层的“自选动作”都没有了,连基层和个体本着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相结合的“自主创新”空间都没有了,这么搞下去的话,在发展进程中社会能起什么作用?企业能起什么作用?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,又能起什么作用?我们现在确实得想想这个问题了。

浙江改开以来 45 年的发展,现在回过头去看,最大的原动力就是民营经济。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,就是个人的致富愿望驱动的经济。然后政府能干什么呢? 现在看

得很清楚了,如果没有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,到时候坑蒙拐骗、强买强卖,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都来了,就像吴敬琏老先生说的,那也不是“好的市场经济”。最后还会因为政商关系污浊、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社会撕裂甚至社会动荡,甚至改开成果尽付东流。

所以,制度供给一定要跟上去,法治一定要完善起来。营商环境最大的确定性,就是健全的法治。现在我们左一个指令,右一个政策,弄得法治的权威不彰、地位弱化,这个营商环境怎么能好?民营企业家的预期怎么会强? 党政的功能在于提供导向和环境,当好裁判;下场子踢球、赢球的事儿,还是要还给球队和球员。

第四个,有些更具体的譬如产业发展的导向也得要与时俱进。制造业、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,这个是不能动摇的。但是到了 21 世纪了,我们也得要再追问一句,当下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制造业? 我们省里编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时候,我参加了郑栅洁省长主持的最后一次专家咨询会,我只提了一条质疑性的意见。我说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搞的“十四五”规划,没有必要去人为地划定制造业在 GDP 总量中所占的比重。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,作为国家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,但就地方而言,要害是自己想清楚,在这个发展阶段,到底是要发展什么样的制造业?

我们现在要发展的,是实施数字化转型以后的制造业,是智能制造业。我们去看看上海特斯拉的生产基地,现场哪看得到什么人? 不是说未来工厂是黑灯工厂、无人工厂吗? 人家是地地道道的汽车制造业,但人家更是面向未来的智能制造业。它的效率是一流的,对我们国内的一众造车新势力,构成了巨大的挑战。在它的成本和价格挤压下,大家都挺难受的。但我觉得这样挺好,当初上海把特斯拉引进来,就是要树一个标杆,可以激活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。不然的话,白拿到人家免费开放的一整套专利,国家又有一系列的优惠扶持政策,那家伙一哄而上,虽然现在生产和销售都是全球第一,但是好不了多少年,后劲又不足了。创新不可持续,就是发展不可持续,那已经投入的一大摊子怎么办? 技术上不断的迭代创新光靠说教没有用,有了这么一条“鲑鱼”进来“搅和”,大家都坐不住了,对吧? 打造良性的竞争环境,就是需要这样做。

我跟宁波和杭州萧山的同志说,你们原来制造业都很强,后来杭州搞了数字经济以后,你们的发展势头好像有点下来了,大家有一阵子也有点困惑。我就讲,只要你们能成功地把数字信息科技赋能和增值应用于传统的制造业,你们的后劲,未来或许比杭州还要大。数字经济包括两大块,一大块是“本体型的数字经济”,即中央讲的“数字产

业化”,包括数字科技研发、数字装备和产品制造、数字基础设施建维、数字内容生产等;另一大块是应用型的数字经济,即中央讲的“产业数字化”,也就是数字科技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广泛而深刻的应用。这后一块数字经济,在整个数字经济大盘中,占到了 70% 左右的大头,是主体部分,但关键是您一定要顺利完成数字化的改造和转型。“人脑+经验”的传统制造业,最后肯定会日薄西山、气息奄奄。它们和那种“电脑+算法”引领和支撑的智能制造,完全是两个水平、两个时代,或谓是“云泥之分、霄壤之别。”

粗浅想到的几个比方,不一定确切。主要是想借此强调几个问题:要达成新的目标定位,需要有新的思维、新的价值观,需要有新的工作导向及其偏好。这个东西一定要跟上来,不然的话,“穿新鞋,走老路”,很可能“换汤不换药”,最后还是“年复一年,山河依旧”。即便是十年八年过去了,有了一些变化,但缺乏实质性的变化,缺乏呼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颠覆性变化,那很有能就会在现代化新征程中再一次落入被动局面。

三是基于“双中心”建设的新目标定位,要给予人文发展以更大的空间。现在提出的“双中心”里面,含金量最高的是后面的“现代化高科技中心”。前面的这个“区域枢纽中心”,尽管带有基础性的意味,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实现的。国家大的交通布局中高铁在此有几个“十字交叉”,不是中心也是中心了。枢纽就是中心。交通枢纽主要是一个布局和建设问题,包括配套的网络,相应的硬件投资和项目实施都还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您能不能把交通的枢纽、高铁的枢纽,最后变成一个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商务流、信息流来来往往、便捷高效的枢纽,变成一个有机整合、功能强大的中心,这个挑战性倒是极其巨大的。

尤其是面向未来,我们国家要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,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经济体,“华山一条路”就只有靠发展动力引擎的转换和重置。要从原来的那种过度依赖廉价的土地、劳动力,甚至是资源和环境等自然物质性要素,今后要更多依靠创新型要素的投入和优化组合。要素是实现了财富创造的资源,创新型要素是个啥东西? 400 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·佩蒂讲了“双要素论”:“劳动是财富之父,土地是财富之母”。现在我们再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,在原来劳动和土地双要素之外,新增了五个要素,劳动也更多指向了马克思所说的“复杂劳动”的承载者——人才。

这五个要素初看起来似乎都有点“虚头巴脑”,但实际上却是未来竞争力最强的创新型要素,也是所谓“软实力”的重要构成:资本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,最后一个数据。有鉴于此,我们对于要素的偏好,也要有所调整优化。

我们因为建区较晚,它的开发空间相对较大。一张白纸,好画最新最美的蓝图,因此不要耽误机遇,这个好的,是个有利条件。但是最要害的,还是你的动力引擎要提升重置。不是一味地造房子,不是平面扩张制造业的生产规模,而是要搞全面创新、持续创新,整个地转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上来。现代化背景下的开发建设,应当是“黄金宝地、寸土寸金”,讲求的是亩均土地的创新收益。如果再能跟“现代化高科技中心”这一新定位有机对接起来,那就是前程远大,无可限量。

在新城开发的过程中,需要更多关注人文素质、思想精神这方面的进步。“双中心”建设既是个创新空间的开发问题,更是个人文发展的问题。进入 21 世纪以后,我总是在宣扬人类社会三个最新的大趋势。第一个就是数智化,也即数字信息科技的智能和智慧化应用;第二个就是绿色化,人类的可持续发展、双碳达标,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。第三个就是人文化,即在中国的语境下,现在得多考虑考虑我们人作为主体所参与的创新、创业和创富的经济活动之灵魂问题,也就是人文精神和价值观的发展和提升。

这个东西也不能说就没有,“四个自信”中的“文化自信”早就说了,而且强调这是“更基础、更广泛、更深厚的自信”。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,真正能够打动内心的,真正能够“融化在血液里,落在在行动”上的那种人文精神,那个文化自信的“魂”,我觉得还是不大足的。如果 2035 年基本现代化以后,我们的 GDP 搞成世界上总量第一大的国家有可能,但我们会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国家呢? 这恐怕还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地区间的竞争也是一个道理,你把总量做得很大,但最后人家是不是觉得下一步发展就要向你“看齐”,成为他们前进的榜样呢? 这里边就有一个人文精神要大幅提升的问题。

无论和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科技创新,还是和生产关系进步相联系的制度创新,背后都有一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人文创新的问题。所有的创新,都需要有“独立的精神,自由的思想”。要倡导多元、包容的人文环境和思维方式。现在那种“要好皆好、要坏全坏”的绝对化思维太普遍了。极端化的思维发展下去,学习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就无从谈起,高质量发展也很难实现。刚才有人讲到了“科学严谨、实事求是”,现在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真不容易,知易行难。但惟其难,更要坚韧不拔地去做。自欺欺人骗得了一时,但骗不了长远。党和国家一路走来过的历史早已证明,什么时候我们做到了实事求是,我们的事业就会比较顺利。反之,我们就会遭遇很多不应有的曲折,会耽误很多的时间,错失不少的机遇。

(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、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)